

“振兴”的姿态与“新进”的意味*

——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论

陈思广

摘要:因征文而起的华北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创作,自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烙印。从获奖与出版的作品看,日伪统治者借“振兴”之名推行殖民文化的目的昭然若揭,“新进”作家的长篇创作也因此具有了程度不一的殖民文化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和冲突的书写,以及反映底层人民不幸生活遭遇的小说,虽然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些反映底层妇女不堪遭际的小说,作者也试图淡化殖民的因子,但作者的投机性与时代的言说环境使他们采取的与现实或疏离或贴近的写作姿态都无法摆脱殖民文化的浸淫。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30—40年代特殊的一页。

关键词: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振兴;姿态;新进;意味;殖民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4)01-0045-06

“七·七事变”后,华北随即沦陷,大批作家纷纷南下,华北文坛顿显荒芜与寂寞。日伪统治者为装点门面,粉饰太平,遂喊出“振兴”的口号,欲通过发掘与培养一批所谓“新进”作家的方式“振兴”华北文艺。在1939年2月至1945年6月这六年间,日伪统治者通过长篇小说征文及其他方式刊载或出版了一批所谓“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给华北文坛增添了一抹“亮色”,亦似乎让人重新看到了华北文坛的崛起。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应当怎样认识“振兴”的姿态?这些“新进”作家的创作又具有怎样的意味?这就是本文所要考察并回答的问题。

一、“振兴”的缘起与姿态

华北的沦陷与作家的南迁使华北的文坛,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倒退与死寂的局面。在1937年7月至1939年7月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华北文坛竟没有出版或刊载一部长篇小说。一些刊物虽以扶持长篇小说创作为名,辟出一定的版面刊载少量的“长篇小说”,但这种或有头无尾,或突然莫名其妙,或虽刊完却仅有几千字的“长篇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强烈质疑^①。直到1939年8月,李韵如自费出版近10万字的长篇小说《三年》后,华北文坛长篇小说的死寂局面才得以打破。不过,这部单一地表达热恋中“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痴情曲,不可能起到为之一振的作用,女大学生自费出版的形式又无以显出官方“振兴”的意愿。于是,日伪统治者以重金为诱饵,开始在各大官办的报刊上征募长篇小说,如《华

* 收稿日期:2013—06—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传播与接受研究”(12YJA751003)

作者简介:陈思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① 鲁风《所谓长篇小说》,《华文大阪每日》1939年第11期。

文大阪每日》就在1939年2月第2卷7月号上刊载启事,悬赏征求12万字左右的长篇现代小说(也征求短篇小说),但效果并不理想。此时的华北文坛依然飘零在孤风寂雨中,以至于《中国文艺》的编者在《编后语》中感叹道“关闭在这氛围里的作家们,好像都失去了创作欲,似乎四肢无力的连笔管也拿不动,而读者们也为着失望与悲观,不但对精神食粮没觉兴味,就是对形而上的事情,也很无精打采的。”“这种现象就是趋入于颓废的倾向,也可以算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情兆,令人很可寒心。”^①1940年3月15日,《华文大阪每日》第4卷第6期公布了第一次长篇小说征募获奖作品,田瑯的《大地的波动》获正选,张金寿的《路》获副选。虽然编者声言获奖作品是从46篇来稿中选出的,但作者的无名与创作质量的平庸依然难举“振兴”之帜。而且,在之后的两年间(1941—1942),华北文坛依旧没有出现像样的现代长篇小说。这对于日伪统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共荣”的尴尬。为此,由武德社主办的《国民杂志》于1942年第2卷第2期刊出“本刊大征文(长篇小说)启事”,征求以“描写中国民众的真实生活”为内容的1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以“振兴”华北文坛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启事写道:

伴随着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的新年伊始,国民杂志也要开始着一个新的出发,并且企图着飞跃着前进。

这次举办长篇小说大征文便是本志革新的具体表现之一。

华北尽有着许多刊物,但出版界其实是贫弱而浪费。华北尽有着许多作家,但文艺界却是萎靡而堕落。因此读书界对之不是苦闷而焦灼,便是轻蔑和冷淡。考其原因,不是因为刊物办自己的刊物,根本忽视了读者,便是刊物自身拒绝了作者。优秀的写作者自是无从发现,而真正的文学工作者也在如此现状之前搁笔,所以这次大征文的目的,不仅为振兴萎靡而堕落的文风使得文艺界健康的发展而已,还在于打破从来刊物之门罗性,以及唤起全国写作者之热情。

我们知道,在华北除去章回小说家,以及自称“作家”者之外,仍旧存在着许多真正的写作者,但他们表示了沉默。沉默在如今虽在无可非难的,但也并无用处,“清高”的结果,也不过是“绝俗”而已,反而远离了现实。为不负读众的热望,并了解我们暗夜行路的困苦,我仅以十分的热意等候踊跃参加。

长篇小说在事变后的文坛上,没有产生过,所以我们征长篇。写长篇虽在于作者之魄力,但也必须有刊物发表,国民杂志就愿意献出这园地来。

倘若因此次征文为契机而振兴了出版界,使华北文坛健壮起来,而获得出版家、作家、读者间之坚固握手,那我们的喜悦就是无限的了。虽然这也许是一件艰苦的劳作,也许是一件困难的愿望。

1943年1月1日,由孙鹏飞、郝庆松、王则、德玉葆、张金寿等组成的审稿人在第3卷第1期的《国民杂志》上宣布征文结果“正选:天津杨鲍的《生之回归线》;副选:宣化刘延甫的《新生》。”同时在引语中说“本刊一千五百元征文,曾一度展期至十月末日,这中间收到计由华南、南中、蒙疆各地寄来的稿件,不下百数十件,在审选时,承审选者始终维持着起初的热,终于拔擢出下列两篇发表于此,对这,我们不敢说什么‘我们要建设华北文坛’,但是在发表难、写作难、稿费难诸声中,我们愿掘发出这两位新人献于华北文坛。”对这次征文,编辑也较为满意,这从该期的《编辑后记》中就可看出“长篇小说自去年一月号刊登启事以来,整整一年,中间因为来稿缺乏正选,便延迟到本期才发表。当选者两篇的好坏不论,仅以写作者的热情来看,我们便不能不高兴的。在现今华北文艺界,长篇小说可谓太少见了,一则作者缺乏写作的勇气与生活经验,二则没有刊物肯给予鼓励也是实在的情形。本刊自去年革新以来便注意及此,不惜以千五百元的赏金与很多篇幅来贡献华北的文艺界。这次的发表,或者能够与华北文艺界一种兴奋剂,因之而能激荡起更多青年的写作的勇气来,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之后,《国民杂志》还举办了第二次长篇小说征文并公布了获奖作品。与此同时,另一具有很大影响的文艺刊物《中国文艺》也辟出版面刊载现代长篇小说,如闻国新的《蓉蓉》等。华北文坛的长篇小说创作渐至复苏。在1943至

^① 《中国文艺》(创刊号),1939年9月1日。

1945年间,一些新进作家纷纷出版了他们的长篇小说,如袁犀的《贝壳》(1943)和《面纱》(1945)、沙里的《尘》(1944)和《土》(1945)、关永吉的《牛》(1945)、赵荫棠的《影》(1945)等。华北的现代长篇小说创作终于有了“振兴”的模样。

诚然,从表面上看,在日伪统治者的鼓噪与扶持下,1943—1945年间“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似乎给华北沦陷区的出版界带来了几丝“振兴”的味道,也给华北文坛增添了些许“亮色”,但这显然是回光返照。随着日本的彻底投降,这些依附在日伪统治集团下的“新进”作家们,自然失去了继续从事创作和出版的机会,他们的创作实践也因之定格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区间。

二、“新进”的意味

据笔者统计,若以彼时长篇小说征文字数(10万字)为限,1939—1945年间,华北沦陷区共发表或出版“新进”作家的长篇小说15部。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 赤裸裸地美化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行径,公然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涂脂抹粉

田瑯的《大地的波动》是《华文大阪每日》第一次长篇小说征文正选之作。小说写16岁的健生告别恋人翠娥奔赴前线抗日,负伤后死在一个小镇里。翠娥与老祖母逃难,过着行乞讨饭的困苦生活。健生的父亲王纲趁日军入城之际,谋得维持会长的职务,但因侵吞公款及儿子从军等原因被革去职务。他曾为此拜访日军及当局县长,希望官复原职,但未能成功。他的妻子得知儿子健生死讯后变疯,被王纲监禁在暗室中。王纲的弟弟王纪穷困潦倒,靠收废品为生。一天,王纪开门时发现门上靠着一具被暗杀的尸体,惊慌失措,之后逃离了家乡。其妻陈香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与流氓周大荣一起生活,忍受他的虐待。王纪逃到北方后,历经困苦,后当了水手。半年后他回到家里,却得知妻儿早已出走,他再次离开了家乡。

乍一看,小说的故事好像并无大碍,其实作者完全是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为其侵略中国而涂脂抹粉的。作品的主旨就是宣扬“中日提携”、“东亚共荣”,合作则兴,抵抗则死,留守则保全生命,逃难则家破人亡。因此,小说写与日本合作的留学生升为县长,参加抗日的青年健生负伤死在缺医少药的小镇里,逃难的翠娥、陈香、王纪等挣扎在死亡线上,抗战区百姓的生活则苦不堪言。为表现作者的这一思想,小说中露骨的描写比比皆是。例如,小说写当日本军队进城时,王纲带领一些绅士见日本大佐,感谢日本军进城保护良民,维持治安,发誓要本着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理想,振兴东亚,互相提携,以建设新中国。他还给他老婆玉英讲,此次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为了防共和打倒共产党傀儡的抗日政权而举的正义之兵,并不是与一般中国民众为敌对,中国民众应予以支持,同心协力,共同为建设东亚而奋斗,并对日本大佐佩服得五体投地。王纲还以治安维持会长的身份在县民众教育馆召开的民众大会上作《中日提携与新中国之诞生》的发言。一派无耻谰言!一副丑恶嘴脸!

《新生》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汉奸小说。作品写大学生俞经和茵这对恋人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时,因“七·七事变”而被迫中断学业,俞经回了家,茵则去了南京。俞经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绅士,家徒四壁的李吉因心眼直而被人称为傻李,一直未能娶亲。不久,日本人建立了维持会,俞老先生在侄子周学仁的鼓动下挂名当了维持会长和警察局长。由于周学仁爱恋俞经的妹妹俞绮,而俞绮和俞老先生都不同意,周学仁便告俞老先生“通匪”之名,俞绮只好被哥哥带着躲进了傻李家。岂料,第二天夜里军队来到俞家带走了父子俩。第三天夜里又传来枪声时,傻李慌忙带着俞绮外逃,但跑了没几步就被击中倒地。正当他们绝望时,却发现来的是长工老吴和哥哥带来的剿匪联队,一家人重又团圆。随后,周学仁被判10年徒刑,傻李也养好了伤。经过这件事后,俞老先生忏悔自己看错了人,遂同意将俞绮嫁给傻李。而俞经也接到了茵的来信,说国民政府还都了南京,她也加入了“和平运动”,鼓动俞经也来参加。俞经接信后备感鼓舞,决心第二天就赴南京共同“和平、奋斗、救中国”。

可见,这是一部十足的瞎编乱造的反动作品,也是一部杜撰的充满奴颜媚骨的说教小说。且不说其

中充满着虚假的、荒唐的情节,仅说作品的立意及结尾公然喊出的汉奸汪精卫的卖国口号,就是典型的“汉奸文学”。虽然小说在局部上有一定的艺术性,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它为配合汪伪政权的“和平运动”并服务于其政治纲领的艺术指向,丝毫不能掩盖作者为迎合日伪集团而歌颂日本奴役下的“新中国”、“新秩序”的丑恶嘴脸,丝毫不能掩盖作者丧失民族大义而出卖灵魂鼓吹和平建国的汉奸本质,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毫不过分。

其他像如水的《海滨的忧郁》,美化日本侵略者丑恶行径的意图也相当明显。

(二)以相对遮掩或较为隐蔽的写作姿态传递出亲日或反英美的旨向

与前一类作品明目张胆地为日伪统治者歌功颂德不同,这类作品虽写得较为隐蔽,但其亲日反美的立场与主旨依然凸显其中。《生之回归线》写主人公朱永强不甘现状,怀着憧憬来到城市,但由于先天不足,虽勉力劳作,辛苦挣扎,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身处底层的痛苦与现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现实,更不能改变社会的黑暗与不平。他虽然心怀一颗不平与奋斗的心,好不容易遇到了领路人,重新找回了自己,但现实的污浊与人世的炎凉、时代的颓废与社会的黑暗,还是彻底击碎了他的城市黄金梦。他不得不做出了暂时离开城市而重返家园的选择。

那么,朱永强为什么回乡呢?我们看小说第七章朱永强父亲来时与他的一段对话:

永强关心自己的家乡,问父亲:

“家里可平静?”

“太平静了,现在咱家可比以前胜强了百倍,那真可说是太平岁月,收成好,粮米又卖的上价。”

“土匪呢?”

“土匪?连个影子也没有啊!自从××队管辖了地面,土匪谁还敢来?”

“只要日子安宁就……”

“太安宁了。”老人脸上浮满了欣喜,“现在,咱那村子,要是跑了一匹小驴,都没有人敢领。”

“没想到这年头竟这么太平。”

将日伪统治下的家乡的光景称为“太平岁月”,而且是前所未有的“匪患”全无的太平岁月,这不也是替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涂脂抹粉吗?这不也是汉奸逻辑和奴化思想吗!?正是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使作者将一部展示农村有为青年不甘贫穷、几经风雨、几经奋斗、最终初步实现人生理想的励志小说,写成了一部虽局部有着一定的生活气息,但却有违生活哲学且支点严重迷乱的“危险品”。作者将从起点到起点的这一重返乡村的人生之路喻之为“生之回归线”,并对此表示由衷的赞美。遵奉并呼应了汉奸文学理论的创作方针与创作要求,暴露出日伪统治下奴性思想对作者的侵蚀与浸淫,显示了作者思想的贫乏与反动、荒谬与悲哀。

袁犀的《贝壳》也是如此。表面看来,这是一部以大学生恋爱与婚姻为题材,讨论什么是爱情以及女人的位置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表达爱情观、婚姻观的一部感伤小说;实际上,作者借思考什么是爱情这一人生命题,“暗示了自由主义的欧美思想之毒害,对于个人主义的恋爱观,作了最严的批判”^①;而它所透露的反英美的倾向,正暗合了“大东亚文学奖”的宗旨。女主人公李玫受所谓的欧美思想的毒害,信奉个人主义的恋爱观,其结果是道德沦丧,婚前婚后均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欲做贤妻良母而不得;李玫的妹妹李璆之所以没有上当受骗,就在于看穿了白澍裹在诗人外衣下的奸诈行径;而白澍、吕桐的所谓个人主义恋爱观,其实就是游戏人生、张扬欲望的市侩哲学,其结局不是被人识破就是被捕入狱。由此证明,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是一个混乱而错位的观念体系,是造成青年男女,特别是青年大学生人生不幸、精神痛苦的主要原因。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典型情节:当李玫的丈夫赵学文将印有吕桐被捕的报纸递给李玫看时,说“教育收到了相反的效果,知识补助了犯罪,一个大学毕业生是制毒机关的首领,从他的住所,说是还搜出了原文的杜威博士的论文集呢。”而报上刊载的吕桐被

^① 《贝壳》的广告,见《文学集刊》第2辑,1944年1月。

捕的标题竟然是“大学教育的成果 麻醉药之密输犯 制毒机关之首领——吕桐。”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且不说将犯罪的原因归结为“大学教育的成果”是如何不值一驳,仅说从吕桐住所搜出“原文的杜威博士的论文集”就何等的不伦不类!实在难以想像,作为哲学家、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杜威的原版博士论文集与需要用化学原理制毒品的吕桐有着怎样的必然关联!唯一或可解释的便是,欧美思想的侵蚀使一个有为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杜威就是他们的“罪魁祸首”,而这本原版的论文集则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铁证”。这是何等荒谬绝伦的逻辑啊!这不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反英美思想 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文化闹剧吗?!

(三) 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表现了底层社会人民的不幸遭遇

为装点门面,《国民杂志》在举办长篇小说大征文时,将“描写中国民众的真实生活”作为征文的重要元素,这自然使得一些“新进”作家纷纷投其所好,张金寿的《路》就因之获奖。小说写许怀民由于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只得放弃继续上学的念头转而至工厂去当学徒。三年后他虽然学满出师,但却一直无法认同底层(师兄弟们)本真却粗俗不堪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因而也无法真正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几年来,许怀民虽然默默地承受生活的重压,但内心的倔强以及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念头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要好的朋友也劝他努力改变自身命运,但怀民念及年迈的父母以及自己身为长子的重任,不得不在枯燥与烦闷中煎熬挣扎。卢沟桥事变后,许怀民失业在家,这使他有时间认真思考自己的命运与未来的选择。迫于生计,他写信向他最要好的朋友义群借钱,却遭到了拒绝。他的那些师兄弟们也一个累得吐血而死,另一个已开始吐血。看到这种惨状,怀民彻底地清醒了过来。虽然他的师傅为他在铁路上重新找了一份工作,但他毅然决定辞掉这份工作外出学习。他知道这几年来他就是耽误在延宕之下,由延宕而产生依赖心理,由依赖而陷入困境。现在他终于明白:路只有靠自己走去,虽然这条路不能奔向光明尚不得而知,但至少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道路,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小说通过对许怀民由屈从命运到为命运抗争的心路历程的描写,再次印证了一个平凡、朴素却耐人寻味的道理:靠天、靠人,不如靠自己!小说的基调有些沉重,但这沉重却正契合于那个悲惨岁月的时代氛围。《生之回归线》也是如此,虽然主旨媚骨,但作者对吃人社会淋漓尽致的揭示与对人性丑恶的鞭挞,以及对生活中不乏美好人情的讴歌,都使这部作品成为反映一个特定时代的具有局部真实性的一份现实记录而令人回想。特别是曾有着同样经历的底层工友们,当他们读到作者以慈善会杂役、饭馆小工、图书馆杂务、旅馆仆役的身份遭受屈辱时,不禁感触于心,共鸣于怀——张金寿就因有着一段相似的经历而对之“深深爱着”,并投出了自己赞成的一票^①。

如果说《生之回归线》与《路》反映了底层小工的不幸生活,那么《蓉蓉》与《影》就反映了底层妇女的不堪遭际。爱好虚荣的山村少女蓉蓉一心向往城市生活,但命运不济,与村里教师吴柏生约会时失身,不久吴柏生因战乱学校停办而离开,蓉蓉的母亲也因生产得产褥病而死去,父亲又被占领寺庙的兵开枪打死。无奈之下,蓉蓉抱着“自己的梦自己做”的想法乘坐恶绅赵连芳的车去城里找吴柏生,不料却被赵卖到二百里外的一个妓馆。虽被大房产主黄魁赎出做妾,但又不满足于年过半百的黄魁未能给她带来生理的满足,又与绸店年轻的伙计小王私通,但王伙计很快因携款潜逃而被捕,她也因之受牵连入狱。出狱后蓉蓉重入妓院,更名风仙。一天,因长期吸毒而身体衰败不堪的蓉蓉与吴柏生在妓院重逢,在道明原委后,蓉蓉拒绝了柏生为其赎身重归旧好的想法,在遭受一位嫖客的粗暴蹂躏后死去。

这是一个纯真但又羡慕虚荣的农村少女不甘心生活的平庸,向自己命运挑战、抗争却最终毁灭的悲剧故事,是千千万万个底层妇女不幸遭遇的又一次书写。作者以同情的笔调书写了身处偏僻山村、时逢兵荒马乱之时一个无助女子的富贵梦的破灭之路,将“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揭示得生动而清晰。从蓉蓉自求、自沉、自毁、自灭的短暂人生中,我们看到了提高妇女自身素质的迫切愿望,看到了时代的动荡给山村妇女带来的冲击与影响,看到了中国广大妇女,

^① 张金寿《选后》,《国民杂志》1943年第1期。

特别是农村妇女解放道路的漫长与艰辛。

与《蓉蓉》异曲同工的是赵荫棠的《影》。小说写北京的大学教授费村因和妻子不和,遂去妓院散心。期间,他认识了少妇李依兰,觉得她像萧太后便动了真情。虽然汪太太告诫他依兰有吸食海洛因的嗜好,但费村仍抱着同情与能改造好依兰的愿望与她同居。六年间,费村想方设法都无法戒掉依兰吸食毒品的恶习,依兰也在抽一戒一抽的反复中让费村彻底失望。最后,费村在赔了一笔钱并立下出棺费的字据后,与依兰一刀两断。依兰重操旧业。四年后,依兰在风雪中倒下。表面看来,这是一部表现大学教授狎妓吸毒的作品,实际上是一部揭示底层女子不幸命运的悲曲。小说借依兰不幸的一生表现了底层妇女失去依靠后无奈无助的道路与悲酸痛苦的命运。这些身处底层的女人们都有着不幸的遭遇,有着同样的归宿,令人心寒,令人悲愤。

反映现实生活与不幸人们的不幸遭遇的还有关永吉的《牛》。只可惜这部以牛象征不屈不挠、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农人,象征着恋土地、热爱家乡、回馈自然的大地之子,象征与牛有着同样遭际的以高五爷为代表的田主们的坎坷命运的长篇小说,由于对造成田五爷一家悲苦命运的“狼”——乡村恶霸的揭示并不清晰,对其他人物的性格塑造也缺乏有力的刻画,对矛盾的产生与冲突的结果表现得过于简单而仓促,命运转变也过于随意。虽然其中蕴含着苦涩与疲惫、辛酸与悲哀,但总体表现并不到位,使得故事的情节失去了应有的张力。

(四) 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

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特例。沙里的《土》是这一冲突的典型作品。冯镇因铁路修通后成为买卖粮食的中转站,刘永福看到商机,遂与范村长、杨老二合股开了“同合兴”车店。第一年,车店生意很兴隆,于是,刘永福想扩大车店,不料铁路前移,60里外的冯东站成为新的转运中心,冯镇的兴旺昙花一现,刘永福的车店被迫倒闭。刘永福不甘心家业败落,也不听从他人的建议去冯东创业,决心就在冯镇种地,依靠土地重置家业。不巧的是,一场大冰雹与随后的连绵阴雨及暴发的洪水使一年的辛苦化为泡影。开春,刘永福再做一搏,不惜典当青苗,但终因劳力短缺,工钱大涨,高利贷盘剥,被迫再次卖掉自己的土地(包括坟地),还贷作罢。看着滚滚东流的西拉木伦河,他充满困惑:这难道就是靠土地吃饭的人们的命运吗?

这是一部表现现代文明与传统观念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小说。现代文明的到来不可遏止地冲击着旧有的思想观念,使那些长期恪守旧传统的老一辈农民尤其感到世事艰辛。土地所给予的一切让他们热恋旧土并遵循先辈们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维持生存,对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新事物往往排拒有余而接纳不足,这使他们渐渐被现代文明所遗弃,成为传统观念的悲者。刘永福们的悲剧即是如此。诚然,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并非单一的观念滞后,天灾同样是夺人精神的致命因素,特别是扼人咽喉的高利贷更是扑杀农人最后希望的致命绞索。

三、结 语

由上可知,因征文而起的华北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创作,自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文化的烙印。从获奖与出版的作品看,日伪统治者借“振兴”之名推行殖民文化的目的昭然若揭,“新进”作家的长篇创作也因此具有了程度不一的殖民文化的意味。即便是那些反映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的书写,以及反映底层人们不幸生活遭遇的小说,虽然在局部上有一定的真实性;那些反映底层妇女不堪遭际的小说,作者也试图淡化殖民的因子,但作者的投机性与时代的言说环境使他们采取的与现实或疏离或贴近的写作姿态都无法摆脱殖民文化的浸淫。也正因此,那些所谓的“新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之后的岁月中大多沉入历史的深处。这是华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上世纪30—40年代特殊的一页。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 赵洪艳】